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阿马蒂亚·森 著

伦理学与经济学

ON ETHICS & ECONOMICS



商务印书馆

B02-055
7

伦理学与经济学

阿马蒂亚·森 著
王宇 王文玉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00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伦理学与经济学/(印度)森著;王宇,王文玉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ISBN 7-100-02917-1

I. 伦… II. ①森… ②王… ③王… III. 伦理学—
关系—经济学 IV. B82-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9169 号

LÚNLIXUÉ Yǔ JINGJIXUÉ

伦理学与经济学

阿马蒂亚·森 著

王宇 王文玉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2917-1 / F·367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0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4.5/8

印数 5 000 册

定价: 10.00 元

献给肯·阿罗

目 录

前言	1
自序	6
1 经济行为与道德情操	7
两个根源	9
成就与缺陷	13
经济行为与理性	16
作为一致性的理性	18
自利与理性行为	20
亚当·斯密与自利	27
2 经济判断与道德哲学	33
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	33
帕累托最优与经济效率	35
效用、帕累托最优与福利主义	41
福利与主观能动	43
评价与价值标准	44
主观能动和福利：区别与相互依赖	46
效用与福利	48
成就、自由与权利	50

自利与福利经济学·····	53
权力与自由·····	57
3 自由与结果·····	60
福利、主观能动和自由·····	60
多元性与评价·····	63
不完备性与过度完备性·····	67
冲突和僵局·····	70
权利与结果·····	72
结果评价与义务·····	75
伦理学与经济学·····	79
福利、目标与选择·····	80
行为、伦理学与经济学·····	88
参考文献·····	90
人名索引·····	123
名词索引·····	133

前 言

对于那些关心当代经济学与道德哲学之间关系的经济学家、IX
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们来说,这本书可谓是一个思想“宝库”。阿
马蒂亚·森教授清晰、通俗、活泼和富有激情的写作远远超出了那
些对伦理学与经济学文献的简单综合。在全新的意义上,他阐述
了一般均衡经济学能够对道德哲学分析所做出的贡献;道德哲学
和福利经济学能够对主流经济学所做出的贡献。并指出了,对自
利行为假设 *assumption of self-interested behaviour* 的滥用已经严
重损害了经济分析的性质。

阿马蒂亚·森论证了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严重分离,以及这一分
离如何铸就了当代经济学的一大缺陷。他令人信服地指出,由于
伦理考虑(*ethical consideration*)影响了人类的实际行为,而影响人
类行为的正是伦理学的主要任务,因而就福利经济考虑(*welfare-
economic consideration*)^①也就必然影响人类的实际行为,由此可
见,福利经济学与现代逻辑经济学(*modern logistic economics*)是有
联系的。但是,正如阿马蒂亚·森所指出的那样,逻辑经济学已经
对福利经济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福利经济学却没有对逻辑经

① 伦理考虑中的一个方面。——译注

济学产生任何实际影响。

x 阿马蒂亚·森说明了经济学伦理根源和逻辑根源的各自的合理之处,并强调指出,现代经济学所使用的逻辑方法往往是非常有效率的,正是由于广泛地使用了这一方法,现代经济学才较好地解释了社会相互依赖性的本质,并较为清楚地说明了一些实际问题。“一般均衡理论”的发展演变就是一个例子,阿马蒂亚·森说明了它在研究饥饿和饥荒这类重要问题中的实际应用。

阿马蒂亚·森的基本观点是,经济学,正如它已经表现出的那样,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地关注构成人类行为和判断的伦理思考而变得更有解释力。通过简洁的阐述,他分析了可能造成偏离经济理论中标准行为假设(standard behavioural assumptions)的几种性质不同的伦理考虑。这些考虑可能产生于不同的内在价值评价(intrinsic evaluation)与工具价值评价(instrumental evaluation),这些评价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集体的。阿马蒂亚·森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造成这些偏离的不同原因,即这些使当代社会行为的工具作用变得可信赖的原因。这类行为^①有可能明显地违背个人的占优策略(dominant strategy),因为,即使人们没有知识方面的任何缺陷,特定类型的团体—理性条件(group-rationality conditions)也常常会影响人们的实际行为。接下来,阿马蒂亚·森阐述了通过更多地关注伦理学如何能使福利经济学更加充实;在个人和集体行为的确定中,给福利经济学留下更多的空间如何有利于改善经济学的描述、预测和政策;反过来,与经济学更紧密的联系如何能

① 出于工具价值方面的考虑而采取的行为。——译注

使伦理学的研究受益。

可以理解,虽然阿马蒂亚·森对经济学持有批判的态度,但他并不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已经在伦理学的文献中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因此,现在的问题不是简单地把伦理学文献中的一些结论移植到经济学之中。他认为,一些伦理思考可以用经济学正在使用的各种方法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p. 71)。借助于关于权利与结果的现代文献,他证实了这一观点。他指出,如果不把权利仅仅看作具有工具作用的基本法律实体,而是把它当成具有内在价值的基本法律实体,那么,这些文献就可能得到更大的丰富和改进。进一步地,对于如何把研究相互依赖性的经济学所使用的典型结果推理,应用于权利与结果的形式化分析中,他也提出了系统的建议。 XI

在最初的论述中,阿马蒂亚·森指出,现代伦理学文献的内容远比已进入经济学中的内容更加丰富,是经济学中极为狭隘的自利行为假设,阻碍了它对一些非常有意义的经济关系的关注。主流经济学把理性的人类行为等同于选择的内部一致性(internal consistency of choice),并进而把它等同于自利最大化。但是,正如阿马蒂亚·森所指出的那样,既没有证据表明自利最大化是对人类实际行为的最好近似,也没有证据表明自利最大化必然导致最优的经济条件。^①他以自由市场经济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比如在日本,那里以规则为基础的行为,系统地偏离了自利行为的方向——责任、荣誉和信誉——都是取得个人和集体成就的极为重要的因素。他指出,如果我们正确地理解了亚当·斯密,那么无论是在伦

① 帕累托最优。——译注

理学,还是在经济学中都不会出现对自利行为的狭隘解释,以及对这一解释的支持和倡导。

正如阿马蒂亚·森所证实的那样,从技术上说,在某种极为有缺陷的条件下,福利经济学才会承认完全依照自利行动假设行事是伦理正当的。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一理论的实践意义仍然非常值得怀疑。他提出了这一分析所依据的“福利主义的”概念的局限性。通过区别“福利方面”(well-being aspect)(就个人利益而言,一个人的成就和机会)与“主观能动方面”(agency aspect)(就更广泛的目标而言,一个人的成就和机会),阿马蒂亚·森的分析超越了一个人对单纯自己福利的追求,并得到了更有解释力的结论。阿马蒂亚·森区别了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与更为广泛的个人或集体价值判断,进而引出了对“多元性和评价”(plurality and evaluation)、“可公度性”(commensurability)、“完备性和一致性”(completeness and consistency)、“不可能定理”(impossibility theorem)以及实证可能性结果和结构特征的讨论。把近年来关于结果主义的哲学文献应用于经济学研究,阿马蒂亚·森论证了这种推理——包括相互依赖性和工具价值计算——不仅可以与内在价值相结合,而且可以与道德评价中的立场相对性和行为主体敏感性相结合。他证明了,在符合实际的假设条件下,一个广泛的逻辑一致分析可以为权利与自由这类基本问题的描述提供一个具有敏感性和稳健性的框架。

阿马蒂亚·森认为,对经济学理论中标准行为假设的偏离——结合自利行为的最主要构成部分——可能产生于个人或集体的内在价值评价和工具价值方面的考虑。这一看法是非常中肯的,并

可以应用于解决标准经济学中因外部性影响(externality)、非市场依赖性(non-market interdependence)、对政府的经济政策缺乏信任等因素所导致的效率失败(failure of efficiency)问题。阿马蒂亚·森认为,如果允许对自利行为的偏离进入经济学分析的话,那么就应该重新定义或表述解决这些问题的激励。他坚持认为,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是否可以被认为在追求某种目标的最大化是相对的,它取决于单个行为主体或团体把什么看作是可适当控制的变量,以及把什么变量视为是可实际操作的手段。当为了追求个人目标而接受了特定社会行为准则的工具价值时,就会造成个人表面上追求的目标与其真实目标之间的模糊性。在这种情况下,互惠必然取得工具意义上的重要性,否则,就很难说明人们的“真正目标”不是对互惠的追求。通过强调行为准则与行为本身应该在经济学中得到更紧密的结合,以及达到这一目标的系统方法,阿马蒂亚·森指出了对不同福利经济准则进行更深入分析的途径。

本书是阿马蒂亚·森根据他 1986 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洛尔讲座 Royer Lecture 的讲稿写成的,该校经济学系和哲学系的师生们很高兴有阿马蒂亚·森这样一位真正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为他们所作的这次讲座。我们相信,读者也会和我们一样感激阿马蒂亚·森教授划时代的贡献,并分享 Rene Olivieri of Basil Blackwell 正式出版此书的恩惠。

约翰·勒蒂奇

自序

xv 本书是根据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所作洛尔讲座的讲稿编写而成的,时间是1986年4月4日至6日。我衷心感谢该校经济系、哲学和政治科学系邀请我作这次讲座。在访问伯克利期间,我受到了热情的款待,该校活跃的学术氛围也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在本书的写作准备过程中,我与杰克·勒蒂奇、马尔萨·努斯鲍姆、德里克·帕菲特和贝纳德·威廉姆斯进行了讨论。埃尔马·阿戴尔曼、乔治·阿克洛夫、普拉纳比·巴德罕、多纳尔德·戴维森,约翰·哈萨尼、乔斯林·基恩克、萨缪尔·谢弗勒和本杰明·沃德对本书的一些内容进行了评论,讲座现场也有一些热烈的讨论,这些对于本书的编写都有很大帮助。最后,我还要感谢夏洛林·维丝迅速打印出了我的手稿以及埃玛·戴尔丝出色的编辑工作。

阿马蒂亚·森

1 经济行为与道德情操

在一首还不算太拙劣的诗中,本特利(Edmund Clerihew Bentley)这样谈到经济学——曾经一度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位主要创立者: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凭着坚强的意志
克服了他那天生的温顺
写出了《政治经济学原理》

很清楚,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非常有效地克服了他那与生俱来的友善是应该被庆贺的;但不完全清楚的是,是否也应该庆贺政治经济学为了自己的所谓需要而对但丁名言的诠释,即“对你周围的所有的人,抛弃所有的友善!”也许,作为个人,经济学家会表现出得体的友善,但在其经济学模型中,他们却假设人类的行为动机是单纯的、简单的和固执的,以保证其模型不会被友善或道德情操等因素所干扰。

这种经济学观点显然是相当普遍的(从经济学已经走过的道路来看,也并非没有道理),但是,纵观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以如此狭隘的方式来描述人类行为却是非同寻常的。其不寻常处首先在于,经济学所关注的应该是真实的人。很难相信,由苏格拉底问题 2

(Socratic question), 即“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所引发的自我反省会对现实生活中的人没有任何影响。正如贝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1985)所指出的那样, 这一问题对于伦理学来说也是一个发人深省的核心问题。经济学所研究的人真的能够不受这一富有挑战性的问题的影响, 并一成不变地恪守现代经济学所给予他们的那种不健全的精明和现实吗?

另一个不寻常之处在于, 现代经济学不自然的“无伦理”(non-ethical)特征与现代经济学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事实之间存在着矛盾。不仅被尊称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曾经是格拉斯哥(一个充满实用主义的城市)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 而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 经济学科曾经认为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直到不久以前, 经济学还是剑桥大学道德科学荣誉考试中的一门课程。这些事实是判断经济学本质的传统实例。事实上, 在30年代, 罗宾斯(Lionel Robbins)在其《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这部极有影响力的著作中就曾经指出: “除了把这两种研究(经济学与伦理学)并列, 以其他任何形式把它们结合起来的企图, 在逻辑上似乎都是不可能的。”^① 那时, 他的这一观点并不为人们所接受, 现在却十分走红。

① 罗宾斯(1935, p. 148)。当然, 罗宾斯充分意识到他的观点与当时流行的看法是不一致的。

两个根源

事实上,我们可以说经济学有两个不同的根源。这二者都与政治学有联系,不过联系的方式却大不相同。一方面经济学可以联系到“伦理学”,另一方面经济学又与我们或许可以称为“工程学”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传统联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The Nicomachean Ethics》)的开篇,亚里士多德就把经济学科与人类行为的目的联系起来,指出了经济学对财富的关注。他把政治学视为“指挥者的艺术”,强调政治学必须使用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其他科学”,“再者,因为它用法律规定了我们能做什么与不能做什么,所以这门科学的目的中就必须包含有其他科学的目的,以使这一目的有益于人类”。虽然从表面上看经济学的研究仅仅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有直接的关系,但在更深的层次上,经济学的研究还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其他目标的追求有关,包括对更基本目标的评价和增进。“挣钱是不得已而为之,财富显然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东西,只是因为它有用或者因为别的什么理由。”^① 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这一观点已经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Politics)中得到了说明和发展。^②

① 《尼各马可伦理学》,I. 1 - 1. 5;罗斯(Ross)翻译的版本(1980, pp. 1 - 7)。

② 亚里士多德在论述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时,他坚决主张:“国家的目的”是“美好生活的普遍促进”(《政治学》III. IX;巴克尔(Barker)翻译版本(1958, p. 117)。也可参见《政治学》,I. VIII - X。

因此,经济学研究与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分离,使它失去了用武之地。在这里,对于经济学来说,有两个中心问题尤为根本: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人类行为的动机问题,它与“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这一广泛的伦理道德问题有关。强调这种联系并不意味着人们总是按照维护传统道德的方式做事,只是表明伦理研究不能完全违背实际的人类行为。我将此称为“伦理相关的动机观”(the ethics-related view of motivation)。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社会成就的判断。亚里士多德把社会成就与取得“对个人有益的东西”这一目标联系在一起,并且,他注意到了社会成就判断中的特殊性:“就个人而言,某种目标的实现只是有所值的,但是,对于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来说,这一目标的实现可能有更为卓越、神圣的意义。”(《尼各马可伦理学》,I. 2;罗斯1980,p. 2)我将此称为“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ethics-related view of social achievement)”,虽然这并不能消除社会成就评价中的随意性缺陷,比如,符合“效率”这类评价,但是,它可以使社会成就的评价更富伦理性,而且必须使用更广泛的伦理观点来判断究竟什么是“对个人有益的东西”。在现代经济学,尤其是在现代福利经济学中这样做是非常有意义的。

经济学有两个根源。其中一个,即经济学与伦理学、政治学中有关伦理观念的联系,为经济学规定了不能逃避的任务。那么,现代经济学是否圆满地完成了这些任务呢?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必须首先说明经济学的另外一个根源——经济学与“工程学”方法的联系。“工程学”方法的特点是,只关心最基本的逻辑问题,而不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以及什么东西能够培养“人的美

德”或者“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这类问题。在这里,人类的目标被直接假定,接下来的任务只是寻求实现这些假设目标的最适手段。较为典型的假设是,人类的行为动机总是被看作是简单的和易于描述的。

这种“工程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来自几个不同的方面,其中包括——正如实际发生的那样——几位应用工程师的贡献,如里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一位 19 世纪的法国经济学家, 5 他对于解决复杂经济关系中的技术问题,尤其是那些与市场功能有联系的问题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经济学的这一传统中还有很多更早期的贡献者。17 世纪的经济学家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作为数字经济学(numerical economics)的先驱,在其著作中,就有一个清晰的逻辑中心。这与配第对自然科学和机械科学的浓厚兴趣不无关系。

“工程学”方法还与经济学的研究联系在一起,而这一经济学是从治国方略的技术取向分析中演化而来的。的确,在几乎可以被称之为历史上第一部类似“经济学”的书《*Arthasāstra*》(译自梵文,大致意思是“物质繁荣的教诲”)中,逻辑方法在包括经济政策在内的政策论述中就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考蒂利亚(Kautilya)是印度君主,孔雀王朝建立者旃陀罗笈多(Chandragupta)(著名的阿育王^①的祖父)的顾问和大臣,他写作的时代是公元前 14 世纪。^②

① 阿育王(?—前 238),印度孔雀王朝的皇帝。——译注

② 关于《*Arthasāstra*》的准确日期是有争议的。现存版本似乎是几个世纪之后写成的,而且是以第三人称的方式提到考蒂利亚并引用他的观点。英文译本见拉马斯瓦尼(Ramaswamy)(1962)和莎马·萨斯特利(Shama Sastry)(1967)。也可见克里斯赫纳·罗(Krishna Rao)(1979)和西尔(Sil)(1985)。